

清代云贵总督群体研究

艾成虎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0)

摘要: 清代云贵总督始置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 后经康、雍二朝及乾隆年初近九十年的分合演变, 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最终定型。有清一代, 被朝廷正式任命的云贵总督共83人。从云贵总督的出身背景、任职时长、旗汉比例与籍贯分布等信息的分析来看, 它反映了清廷的用人之道, 折射出清廷和云贵总督辖区的特殊关系以及云贵总督在整个总督群体中的特殊性, 同时也显现了清廷对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策略的调整与深化。

关键词: 清代云贵地区; 云贵总督; 总督群体; 任职背景; 仕途履历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4-0091-05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4.015

On the Group of the Governors in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in the Qing Dynasty

AI Chenghu

(Humanities College,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China 810000)

Abstract: The official rank of the governors in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set up in 1659, and fixed in 1747 after the evolution of almost one hundred years, that is, three dynas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83 governors were officially instal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information analysis, including family backgrounds, duration of offices, the population proportion of Qi and Han peopl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ve places, shows the talent management,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governors in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for the integrated group of governors, and the strategic readjusting and deepening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areas of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governors of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the group of the governors; career background; resume of official career

关于清代总督群体的研究, 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研究视角多聚焦于对清代总督群体的总体考察^{①[1-4]}, 而对深处西南边陲的云贵总督这一独特群体的专门研究则显得不足。本文以云贵总督的出身背景和任职履历为切入点, 采用数据统计和表格分析的方法, 试图勾勒出这一群体的总体形

象及其在整个总督群体中的特殊性。

一、云贵总督的建置沿革

总督之制起源于临时性差遣, 与赞理或参赞军务有关, 属“因事特设”, 朝廷往往对“所辖多, 事重者”加总督之名。^[5]出于军事或政治管制的考虑, 清

收稿日期: 2018-12-08

作者简介: 艾成虎(1993—), 男, 湖北荆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①代表性论著有: 刘伟从督抚权力的变化和运作中探讨督抚制度变迁的轨迹, 参见刘伟《晚清督抚政治: 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龚小峰从民族背景、出身背景和行政经历考察两江总督的群体结构, 参见龚小峰《清代两江总督群体结构考察》; 台湾学者魏秀梅则采用量化分析法, 以清代各督抚的满汉身份、任职年限和出身地域等视角进行列表统计, 反映出督抚制度的变迁状况, 参见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 近年来, 有关督抚群体研究的学术性论著转移到对河道、漕运以及某一朝总督的整体考察。如温凯从清代漕运总督的建置考察了这类群体的结构和类型, 分析其作用并探讨了漕运总督与其它督抚之间的关系, 参见温凯《清代漕运总督研究》。

代西南地区所辖范围时分时合,最高军政长官的选派特征每朝各异,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梳理。

云贵总督之名始见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6],其设置是与清军攻占云贵相联系的。清在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得一省必镇定一省”^[7],即攻占一省便组织军队镇守。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克贵州,次年攻占云南,鉴于云贵地区民族构成复杂、自然环境险恶,不宜满蒙八旗军驻防,故组建云贵绿营兵,置云贵总督统辖。

康熙初年,“四大辅臣”借世祖遗命,大肆调整督抚体制。因而,此时的云贵总督分并频繁,变化较大。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十三日,上谕“直隶各设总督一员,驻扎省城”。全国依省而置总督达15员,云贵总督遂分置为云南总督和贵州总督。康熙四年(1665年),朝廷谕旨总督由每省置一员向两省或三省置一员转变,贵州总督又被并入云南,复为云贵总督,驻扎贵阳府。随着吴三桂在云南“称藩专制”,云南局势转危,清廷为加强对云南的管控力,遂安排云贵总督由贵阳府移驻云南府,自此确立了云南督抚同城的体制,也奠定了清代总督体制的基本格局。其后的雍、乾两朝均只在此基础上作局部调整。

雍正朝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在此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云贵总督的建置也有所调整。有清一代,督抚虽为两个权责不同的官职,但并非完全分途,二者在职权上有相互交织渗透之处。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庚寅,“以杨名时为云贵总督兼管巡抚事,鄂尔泰为云南巡抚兼管云贵总督事”^[8-9]。这种“名实颠倒”的人事安排,反映出雍正帝不拘常规,“因人定制”的性格特征。雍正六年(1728年),广西西隆州土司颜光色聚众对抗官府,广西右江镇官兵前去征剿,广西提督亲往督战,均不能剿平。直到鄂尔泰派兵破屯烧寨,才得以镇压这次反抗,鄂尔泰就此深得雍正帝的赏识。不久以“广西离广东驻扎之处较远,而与滇、黔二省相近”为由,命“云贵总督兼制广西,给三省总督印”,“著鄂尔泰总督云贵广西三省,一应军民事务俱照总督例管辖”。^[10]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帝又以“广西距云南路远,广东路近”(《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48,雍正十二年十月戊午条)为由停云贵总督兼辖广西,与之

前的谕旨大相抵牾。由此可见,雍正帝是借鄂尔泰的“铁血手腕”助其完成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政治构想,同时也为打压时任云贵总督的科目领袖杨名时。所以,云、贵、广西三省总督的废置,彰显出雍正朝职官建置“因人定制”的特点。

乾隆朝,因贵州九股苗叛乱及云南“改流”大业未竟,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癸酉,谕:“贵州苗疆事务,自张广泗经略以来,渐次就绪,但善后事宜,正须料理,必事权归一,始可专其责成。张广泗著授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物,尹继善著为云南总督,专办云南事务。俱另行铸给关防。”(《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0,乾隆元年六月癸酉条)云贵总督遂分置为云南总督和贵州总督。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发生沙罗奔叛乱,清廷奉行“以苗治苗”法,命熟悉苗情的贵州总督张广泗补授川陕总督,调度进剿事宜,“川陕总督员缺著张广泗补授……云、贵二省原系一人管辖,著仍复旧制,即以张允随授为云贵总督;图尔丙阿著授为云南巡抚;孙绍武著授为贵州巡抚”^[11]。自此,云、贵总督复并为云贵总督,终至清朝覆灭,云贵总督的建置再未变动。

二、云贵总督的任职背景

清代,云贵总督属朝廷委任的九大总督之一,抚治一方疆土,因而备受朝廷重视。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云贵总督始置到武昌起义(1911年)的252年间,实授和署理云贵总督职务的共有83人88任,另有2名贵州总督,其中包括任命后未上任和署理的,但不包括因入觐、病假和前后任出现空缺等事而短暂署理的。^[12-13]本文以83位实授和署理形式赴职的云贵总督为统计对象,从出身背景、旗汉比例和籍贯分布三个层面分别加以考察。

(一) 出身背景

清代官员选拔方式分正、异两途。“凡满、汉入仕,有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仕者为正途,余为异途。”整个官场尤以科甲入仕为殊荣,非科甲出身者虽可经保举而踏进正途行列,但亦设有限制,如“不得考选科、道”,“不为翰、詹及吏、礼二部官”^[14],以此来区别流品,严格把控仕途登进。清制将官员明确分等,据

《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凡官之出身有八：一曰进士，二曰举人，三曰贡生，四曰荫生，五曰监生，六曰生员，七曰官学生，八曰吏。无出身者，满洲、蒙古、汉军曰闲散，汉曰俊秀”。通过列表统计得出的数据（见表1），我们可以发现：有清一代的83位云贵总督中正途出身者占绝大多数，其中进士共31人，举人11人，荫生和笔帖式各6人，监生1人，生员7人；异途入仕者行伍虽占16人，但在整个群体中所占比例不高。由此可知，清廷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是“以文治边”与“以武镇边”相结合的统辖策略，对疆臣的派驻多青睐于选择文官阶层。

表1 云贵总督出身背景统计

类别	进士	举人	贡生	荫生	监生	生员	文童	笔帖式	行伍	合计
人数	31	11	4	6	1	7	1	6	16	83

（二）旗汉比例

清代入主中原后仍沿用的是关外时期的八旗军，为巩固统治的需要，最初的满八旗又吸纳蒙、汉武装力量组成24旗，习惯上统称为“八旗”。清代旗人较之非旗人享有区别性优待，表现在官职升迁上尤为突出。从下表2的统计得知：有清一代的云贵总督中旗籍人数有52人，其中汉军旗籍13人，满军旗籍37人，蒙古军旗籍2人，满、汉旗籍比例接近1:3；余下部分为非旗籍的汉族（含1名壮族），共31人，约占总人数的37%；而满军旗籍中有镶黄旗11人，正黄旗6人，正白、镶蓝旗各4人，正蓝旗3人，镶红旗2人，正红、镶白旗各1人，余下7人旗籍信息不详^①；汉军旗籍中有镶黄旗8人，正白旗2人，正黄、正蓝、镶红旗各1人。^②^[15]

表2 云贵总督旗汉比例统计

类别	汉人	旗人			合计
		满洲	蒙古	汉军	
人数	31	37	2	13	83
占比/%	37		63		100

以上统计分析反映出清廷习惯任用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为封疆大吏，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担任云

贵总督者在整个群体中不占优势，且属满汉旗籍的云贵总督又多出自清朝皇帝直系统领的正黄、镶黄和正白“上三旗”，从中也可窥探出清廷统治者对西南边陲治理的用意。同时，满汉旗籍与民族身份不同的云贵总督的任时序列大致呈“对勾”状分布。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之前，满军旗籍者虽占多数，但亦有汉军旗籍者穿插其间，总体上仍是满汉参错分布。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后，云贵总督一职基本上被非旗籍的南方汉人“包揽”，其原因是承平日久的满人在虚幻的“盛世”中早已涤荡了关外时期的尚武精神，八旗将士的战斗力被时光消磨得所剩无几，面对着突如其来的鸦片战争及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清廷统治者再也指望不上八旗兵丁，不得不重用有才干的汉人助其平乱。于是，汉族督抚专权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上演，云贵地区自然也不例外。

（三）籍贯分布

从下表3可知：云贵总督共83人，包括旗人总督52人，汉族总督30人，壮族总督1人；旗人包括满、蒙、汉三旗的旗人；汉人云贵总督的30人中，有湖南籍8人，江苏籍5人，福建籍2人，浙江籍3，甘肃籍2人，江南籍2人，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广西、贵州籍各1人。据此可得出清代云贵总督的籍贯分布十分广泛且各省总督数量相差悬殊的总体特征。

表3 云贵总督籍贯分布统计

省别	旗籍	湖南 (汉)	江苏 (汉)	福建 (汉)	浙江 (汉)	甘肃 (汉)	江南 (汉)	安徽 (汉)
人数	52	8	5	2	3	2	2	1
省别	直隶 (汉)	山东 (汉)	河南 (汉)	湖北 (汉)	江西 (汉)	广西 (汉)	贵州 (汉)	广西 (壮)
人数	1	1	1	1	1	1	1	1

从横向分布来看，湖南籍最多。其主要原因是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过程中趁机发展壮大，令朝廷另眼相看。湘军中的许多将领凭借战功因而一跃成为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故出身

①《清史稿》“列传”及“疆臣年表”中只说明该人物的满、汉族属与一些简略的仕途履历，而清代满人基本属于旗人，故将7名旗籍信息不详的满人划入旗人一列。

②文中数据系笔者根据《清史稿·疆臣年表》和《八旗通志初集·直省大臣年表》统计所得。参见鄂尔泰《八旗通志初集》。

乡勇的湖南籍相对偏多。其次是地处南方的江浙、福建籍，因其经济繁荣、文教昌盛，易形成科举发达的人文荟萃之地，此地培育的科甲人才也往往被授予为封疆大吏。其他如云南、贵州籍若干年不见一人，即使虽有第 76 任云贵总督谭钧培系贵州籍，但在职时间不足一年就远调他乡，主要原因是清代官员实行地区回避制度。如乾隆九年（1744 年）编定的《大清会典事例》规定：“现任各官，有任所与原籍乡僻小路在五百里以内者，均令呈明该督抚酌量改调回避。如应声说回避而不声说并虚捏者，一经查出，皆照例议处”（《大清会典事例》卷 84《吏部处分则例》）。云南、贵州或与之毗邻的广西乃云贵总督辖区〔乾隆六年至十二年（1741 年至 1747 年），广西属云贵总督辖境〕，实行此制可避免地方总督权力膨胀，不服中央管制而出现地方割据的状况。

三、云贵总督的仕途履历

清代官员任期无定制，督抚也不例外。决定其任职时间的长短与皇帝的信任、是否犯错，以及自身具备威服地方、“权兼文武，协和将吏，号民绥辑”^[16]的能力有关。通过对云贵总督仕途履历的统计，可从侧面反映云贵两省的行政运作状况。

（一）任职时长

从表 4 来可看出：云贵总督任期 1 年以下者 30 人，约占总人数的 36%；1 至 2 年者 14 人，约占总人数的 17%；2 至 3 年者 5 人，约占总人数的 6%；3 至 5 年者 17 人，约占总人数的 20%；5 至 7 年者 8 人，约占总人数的 10%；7 年以上者 9 人，约占总人数的 11%。

表 4 云贵总督任期一览

任期	1 年以下	1~2 年	2~3 年	3~5 年	5~7 年	7 年以上
人数	30	14	5	17	8	9

从总体占有比例来看，云贵总督的任期频率波动较大，任职时间 1 或 2 年者竟占半数。通过爬梳史料所得的表格信息可知，任期时长极短的云贵总督主要集中在乾隆朝，其主要原因是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起，因缅甸向中国内属土司征收贡赋，引发了中缅边境冲突，清廷委任的云贵总督人

选因难能速靖缅边而频繁更换。从乾隆三十年（1765 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清廷四次征讨缅甸，均兵败而返，历任云贵总督结局悲惨，或革职拿问，或被迫自杀，或因病解任等比比皆是。例如：第 29 任云贵总督刘藻因未能实现乾隆皇帝提出的“穷力追擒，捣其巢穴”^[17]的战前目标而惶迫自杀；第 31 任云贵总督明瑞迫于缅甸包围又粮尽援绝的窘境自缢而亡。任期稍长的云贵总督主要集中在清道光年间。究其原因乃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英法列强凭借不平等特权以传教事业为名，侵入我国西南地区滋扰事端，清廷欲稳固边防，因而暂弃先前那套“边无常督”的帝王统驭之术，云贵总督在任时间才始长。

（二）离职原因

有清一代的 83 任云贵总督，其离职原因大致有升迁、改调、降调、开缺、致仕、病卒和丁忧等数种。据表 5 统计可知，离任云贵总督中升迁者 14 人，改调者 28 人，降调者 8 人，革职者 5 人，开缺者 4 人，致仕者 2 人，病解者 2 人，病卒者 10 人，丁忧者 2 人，赐死者 2 人，自尽者 3 人，战死 1 人。

表 5 云贵总督离职原因一览

类 别	升 迁	改 调	降 调	革 职	开 缺	致 仕	病 解	病 卒	丁 忧	赐 死	自 尽	战 死
人数	14	28	8	5	4	2	4	10	2	2	3	1

总体来看，云贵总督离职原因以改调最多，达 28 人，占总人数的 33%。清廷通过频繁调动云贵总督，可防止其长期把持地方、培植党羽，形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关系网而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其次是升迁的达 14 人，约占总人数的 17%。其原因是一旦西南局势不稳，清廷就委派新任云贵总督前去整治，待其稳定边方，朝廷以嘉奖为名召回京师，给予六部尚书衔，可谓是“明升暗降”用意颇深。再次，云贵总督病卒或非正常死亡者也不在少数，达 16 人之多。官至总督者年龄已达相当岁数，为报皇恩而不辞劳苦，远赴边督任官，体力不支加上公务繁忙、压力巨大，导致有些总督卒于任上。同时有些总督因办事不力遭致贬官降职，或因自身贪腐而被处死，或犯错而惶恐自杀者也不乏其人。纵观这一群体的在职生涯可知，他们对西南边陲的稳

定及民族团结等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

民族国家的统一。

四、结语

清代云贵总督的建置，始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经康、雍、乾三朝近百年的分合演变，终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成为定制。有清一代，出任云贵总督者共有83位，总督人选大多以正途文官为主，行伍比例不多，这与魏秀梅研究统计的结论不谋而合。^[3]而云贵总督的建置因重大历史事件或当朝皇帝的性格而呈现不同特征。譬如：康熙朝因“三藩之乱”形成了督抚同城的体制，此后总督体制未作大的调整，相当于奠基时期；雍正朝为推行“改土归流”，重用干练股肱之臣，在总督人事任免上“因人定制”，相当于发展时期；乾隆朝为平定西南苗疆边患，采取“以苗治苗”法，同时辅以分置云、贵总督的策略，可视为定型时期。

清廷对云贵总督群体信息（如出身背景、民族成分、任职时长和离职缘由等）的筛选与抉择，反映其对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策略的调整与深化，同时也对该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首先，云贵总督人选由中央直接任命，与整个中央王朝的行政运作节奏相始终，此举加快了西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使云贵边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其次，云贵总督主要选自科甲出身的仕人，汉文化底蕴颇厚，且多遵循“从外籍调本土”的委官原则，当其调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时，无疑给云贵边疆地区注入新鲜血液，是实现云贵边疆地区由乱转治、族际间隙消弭及保障“边”“内”经济文化交流顺畅无阻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最后，云贵总督群体的职能偏重于军事方面，中央王朝赋予其最高统帅的地位，在坚强后盾的羽翼下形成了覆盖严密的防控网络，大大巩固了对西南疆域的实际统治力度，使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实现了内地与边疆、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动，实现了云贵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

〔参考文献〕

- [1] 刘伟. 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2] 龚小峰. 清代两江总督群体结构考察——以任职背景和行政经历为视角 [J]. 江苏社会科学，2009：182-188.
- [3] 魏秀梅. 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 [G]//中国史学论文集：第1辑.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3：703-733.
- [4] 温凯. 清代漕运总督研究 [D]. 长春：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2016.
- [5] 张廷玉. 明史：卷73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768.
- [6] 李文海. 清史编年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7] 皇清奏议：卷3 [M] //罗尔纲. 绿营兵志：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4：3.
- [8] 赵尔巽. 清史稿：卷288 鄂尔泰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9] 王先谦. 十一朝东华录：雍正卷11 [M]. 复印本. 北京：宣统辛亥存古斋印，[1910].
- [10] 蒋良骥. 东华录：卷29 雍正六年十月条 [M]. 鲍思陶，西原，点校. 济南：齐鲁书社，2005.
- [11] 王先谦. 十一朝东华录：乾隆卷25 [M]. 复印本. 北京：宣统辛亥存古斋印，[1910].
- [12] 钱实甫. 清代职官年表：总督年表统计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3] 赵尔巽. 清史稿：卷197-199 疆臣年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4] 赵尔巽. 清史稿：卷110 选举五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5] 鄂尔泰. 八旗通志初集 [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16] 王先谦. 十朝东华录：雍正朝卷2 [M]. 上海：光绪甲午上海积山书局石印，[1894]：5.
- [17] 赵尔巽. 清史稿：卷刘藻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